

# 国家统一与地方政争： 以四川“二刘大战”为考察中心

黄摇天摇华

(四川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成都 610000)

**摘要** 1930 年 10 月,四川爆发了“二刘大战”。大战期间,徐向前、张国焘领导的红军趁势进入川北,南京国民政府也积极介入四川政局,四川因此变成了国民党、共产党和地方军阀相互竞逐的舞台,几方势力纠缠互动、此消彼长,对日后的四川乃至全国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四川也因此成为全国舆论关注的焦点。深入分析此次大战中各方的计虑所在以及全国舆论的关切与期待,当能更深刻地展现南京政府领导的“国家统一”运动所遭遇的困境、挑战及其后续影响。

**关键词** 四川军阀;二刘大战;地方政争;国家统一

**中图分类号** D618.7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1259(2024)01-0000-00

1930 年九、十月间,正值“九一八”国难一周年之际,中国内战依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先是广东二陈之战,继而山东韩刘之战,再而四川二刘之战,贵州方面也随即“倾轧酝酿”。这些触目惊心之消息,“使全国上下屏息吞声一致对外之视线,突遭一意外之转换,使敌人对我无组织无秩序之恶宣传,而竟得现成之证明,使国联中人在畏怯羞惭、旁皇顾虑、无可适从之局面下,而忽得一趋势之藉口,使我国政府当局于焦头烂额、手忙足乱之状态中,而倍增其惶急与烦虑”<sup>[1]</sup>。

在此举国惶惶之际,“二刘大战”的爆发及稍后徐向前、张国焘领导的红军进入川北,以及南京国民政府积极介入四川局势,使四川变成了国民党、共产党和地方军阀相互竞逐的舞台。几方势力纠缠互动、此消彼长,对日后的四川乃至全国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sup>①</sup>。四川也因此成为全国舆论关注的焦点,引发了国人对全国政情的深刻反思。深入分析此次大战中各方的计虑所在以及全国舆论的关切与

期待,当能更深刻地展现南京政府领导的“国家统一”运动所遭遇的困境、挑战及其后续影响。

一、“二刘大战”与红军在川北的发展

1928 年,国民革命军完成北伐后,国民政府虽然在形式上统一了全国,结束了民初的“军阀统治时期”,但“残余的军阀主义”<sup>[2]</sup>依然存在,国民政府尚无法对拥兵自重的地方势力做彻底的控制。其中,四川的“独立”状态甚至较北洋时期有增无减,四川军阀在“易帜”之后依然进行了多次内战,并逐渐演成刘湘、刘文辉二雄争霸的局面,二刘都决心打垮对方,统一四川。

刘湘早就有统一四川的愿望。他曾对其财政处长刘航琛说:“统一四川,就是我们的事业的第一步。第二步是什么,我不知道,但我认为第一步是个事业。”为了取得中央的谅解、鼓励与支持,刘湘特派刘航琛赴京晋谒蒋介石。鉴于刘湘一直都比较顺从南京政府,蒋介石此时也基本倾向于“扶植刘湘,统一四川”<sup>[3]</sup>。1930 年 10 月,国民政府改组四川

收稿日期:2024-01-10

作者简介:黄天华(1985-),男,四川盐亭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系讲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军政机构,特派刘湘为四川善后督办,所有四川驻军统归其全权编遣。源月,刘湘就职,国民政府随之拨付刘湘包括缘万发子弹在内的大批枪械。远月,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选任刘湘为国民政府委员,刘湘亦遵奉南京中央号令,出兵猿万,开赴鄂西“剿共”。苑月,国民政府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发表刘湘为长江上游剿共总指挥。此后,刘湘与南京中央关系愈见密切。而且,刘湘还成功地联合了邓锡侯、田颂尧、杨森、刘存厚、李家钰、罗泽洲等四川军阀共同反对刘文辉。

刘文辉亦是雄心勃勃,有意“统一四川,控制西南,问鼎中原”。刘氏自陈:“员源年至员缘年,是我在四川政治上的黄金时代”,“我那时的主意是:内外并举,左右开弓,即一面在夔门以内加紧消灭敌对势力,去实现统一四川的夙愿;一面乘滇黔军人内讧的机会,支持胡若愚打回云南,支持王家烈打回贵州,为控制西南奠立基础”<sup>[1]</sup>。但是,刘文辉却因在“中原大战”中响应汪精卫等人,与蒋介石积下一些矛盾,故未得到南京的支持。

双方经过一系列明争暗斗,战争终于不可避免。员缘年缘月员日,在刘湘的支持下,驻武胜的罗泽洲首先发难,向驻南充的刘文辉军林云根部打响第一枪,揭开了二刘大战的序幕。随后,刘湘率领联盟各军进击刘文辉部,于缘月猿日进占荣昌、合江,缘月缘日进占泸州。双方几经鏖战,于缘月上旬在老君台签订停战书,暂时结束军事冲突。与此同时,刘文辉为巩固后方,缘月中旬回师成都,与田颂尧展开激烈巷战,缘月初田颂尧已告不支,后经邓锡侯调解,田颂尧与刘文辉达成停战协定,退出成都。缘年缘月中旬,“二刘大战”第一阶段战事结束。

刘文辉兵力虽然损失不大,防地却丧失很多,沱江以东、乐山以南数十县尽为刘湘所据。为扩充防区、夺回地盘,缘年缘月怨日,刘文辉再次率部突入邓锡侯防地,缘月缘日,两军激战于郫县、灌县,“二刘大战”再起<sup>③</sup>。

缘月缘日,刘湘、邓锡侯等在乐至召开所谓“安川会议”,决定联合进攻刘文辉。远月远日,刘湘挥军西进,经过数次大战,苑月上旬,刘湘已攻至成都,刘文辉不得不放弃成都,辞去省主席,退守岷江防线。愿月猿日,刘湘又与杨森、邓锡侯、田颂尧、罗泽洲等联军将领在成都召开“安川剿赤”会议,认为刘

文辉是剿匪的障碍,决定趁机会集力量一举消灭刘文辉的军队。愿月底,刘湘率军攻下雅安,刘文辉部队随之瓦解,一百团以上的兵力仅剩数团。愿月猿日,刘湘宣布安川军事“克期结束”。此后,刘湘控制了四川将近一半的县份,而且都是富庶地区,成为四川势力最大的人,为最终统一四川奠定了基础。

“二刘大战”期间,缘年缘月中下旬,徐向前、张国焘等人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乘机由陕南进入川北,并于缘日进占通江县,缘年缘月占领邻县南江、巴中。至于红军为什么要进入川北,张国焘说:由于四川军阀“素不愿外省军队入境。我们一旦进入川北,敌军因对四川军阀有所顾忌,不会追击我们,他们只能停留在汉中,大致也够疲劳,不能与我们纠缠了。即使他们再来进犯,我们也可凭巴山险要和他们周旋”<sup>[2]</sup>。

缘年缘月,南京政府任命田颂尧为“川陕边区剿匪督办”,田乃调遣一支大军到通南巴地区“剿共”,红军于猿月中旬放弃巴中、南江,缘月缘日离开苏区首府通江,退入川陕边界一带山区。缘年缘月,“二刘大战”再次爆发,田颂尧调大部分兵力回成都。缘月下旬,红军趁机反攻,收复了原有苏区的几个县,并向南推进到营山、渠县,进入杨森防区,随即占领仪陇、南部一带,直趋嘉陵江边,将留在川东的田颂尧余部赶至嘉陵江以西。缘月下旬,又占领宣汉、达县、万源等县城。这样一来,红军完全控制了通江、南江、巴中、旺苍、万源、平昌、城口等县,加上仪陇、阆中、苍溪、南部、营山、宣汉、达县、渠县等,控制面积达源万余平方公里,人口约苑万人。据徐向前说,到缘年末,单是红四方面军就有远万人左右,在缘年军事力量发展到顶峰时,苏维埃的部队保持在愿万人之间。

可见,红军在川北的发展是随四川军事形势的动荡起伏而时盛时衰的。红军入川之初,人员不满猿年,两年之内迅速发展至约缘万人,控制缘县,这对四川军阀和南京政府不能不说是一大挑战。

二摇先“安川”还是先“剿共”:南京政府的应对缘年怨月,“二刘大战”前夕,蒋介石专门致电刘湘分析川战的“危险”。“此次川中万一有事,恐绝非一隅关系,小之足以牵动西南全局,大之足以招致国际压迫,而鄂赣剿匪计划更无法逐步完成,现值国难愈加重时期,吾人益宜事事持重,切盼吾兄极力消弭,设法阻止,俾得渡此最大危险之关头。”<sup>[3]</sup>

当时国联正在调查“九一八事变”,南京政府也冀望国联能主持公道,制裁日本,以外交方式解决中日纠纷,故甚不希望川战爆发,损害“国家体面”,因内战而影响外交。

12月,川战正式爆发后,蒋介石即明确主张“川事亟须设法调解,中央亦不能有所偏袒”;并吩咐杨永泰发电劝告并制止之,“表明中央力持和平之态度,义正辞严之文使知中央力持和平之真意”<sup>〔1〕</sup>;又命令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暂缓回复刘湘“订购步枪一千枝”的要求。在蒋看来,川战“甚非国家之福”;“且国联会议必贻以极不良之印象,国内舆论,亦将受极严酷之制裁”,虽然刘湘“始终拥护中央,论情论理,本应加以援助。惟国难当前,不宜轻启战端”,因此蒋迭令刘湘“万勿加入漩涡为要”<sup>〔2〕</sup>。

12月18日,蒋致电川中各将领,痛陈川战爆发可能造成的恶劣影响:“日本陆军省对现今中国之混乱状态,其当局发表如下之谈话,反驳李顿报告书所言中国正在发展之过渡期,谓:山东省有韩刘之冲突,福建省则有主席问题,十九路军现方与当地军队争夺中,又共产军亦逞威跳梁,青海之南部及西康且被藏军占领,四川全省尤在混乱之中,致南京政府极感困难等语。其他各国表示对我国川鲁等省及各处最近现状极尽热嘲冷笑之致。查李顿报告书方公布于世界,其中叙述虽未尽当,而于我国近年发展之过程颇具相当之同情。乃日本即据我当前现状,持为抹杀一切及应施宰割之口实,以资反驳。凡我军人受兹侮辱,其何能堪,宜如何忿忿痛艾,戮力同心,以图共挽国家之危难。务望各守原防,力避接触,迅求和平解决。勿使川战续发,以杜日人之诬蔑,而免误国之责任。”<sup>〔3〕</sup>

12月24日,蒋介石又说:“关于川局处理,最好固在能使战事消弭不发。但目前形势川中各方酝酿愈急,益显严重。而中央一时亦不得易有效制止之办法,且不可有袒护而援助任何一方之明显表示。”<sup>〔4〕</sup>这清楚地表明南京中央对川局的“有心无力”。

“二刘大战”第一阶段战事即将结束,蒋介石的重要谋士杨永泰对川黔善后做了如下分析:“关于川黔善后,大要有三。甲、处置过早,则趋势不明,诚恐不协机宜,有徒损威信之虑;过迟,则趋势已定,等于事后追认,无权操自上之恩。中央驾驭边省每因

坐昧时机,先后失当,赏不怀德,罚不畏威,酿成不关痛痒之局。欲矫此失,则善后处置,固不宜失之过早,尤不宜失之过迟,是在熟察趋势,当机立断,使扶植者感恩,而失势者亦不敢抗命。现在川黔形势,日益分明,处置之方,似宜及时决定,以免坐失时机。……丙、前此处置川事,意在兼顾各方面,卒不能维持均势,徒使两强对峙,而各派得依违操纵于其间,以促成冲突之祸。现在川省形势,已由两刘对抗,变为刘田联合,且刘田渐已显占优势。处置川事,似宜以刘田为重心。此外,有相当实力,及虽失败而实力尚未完全消灭者,在刘田统驭之下,酌予安顿”;只有这样,才可“弭川黔两省长期混乱之因”<sup>〔5〕</sup>。杨氏此电甚为紧要,其中细致入微地分析了中央政府处置地方政争的思虑及策略,以及维护中央威信的苦心孤诣,难怪蒋介石认为杨氏的分析切中肯綮而大为欣赏。

而中央政府在处置地方政争中的进退两难也在此电中表露无遗。据报道,南京中央“对川战极重视,连日会议,均有讨论,冀磋商一永久和平办法,以解决川事”<sup>〔6〕</sup>。在戴季陶、石青阳等人的提议下,南京政府也重申1935年12月所发表之“治川纲要”,作为解决川局之办法。此举却遭到刘湘等人的抵制,刘湘的代表邱甲就说,戴季陶“所提十七年解决川局方案,已属陈迹,且太空洞,难解决。中央所定办法,对川情终嫌隔膜”<sup>〔7〕</sup>。当时,南京也组织川政整理委员会,或派张群入川调查、调解,也遭到刘湘的消极抵制。本来刘湘冀望得到中央的“鼓励”和支援,多数国人也认为“刘湘殆得中央后援”,事实却出乎意料。这导致了刘湘与南京政府不合作,埋下了日后双方破裂的祸机。

刘湘等人与南京中央在先“安川”还是先“剿赤”上存在着明显分歧。刘湘认为:“就表面观察,‘剿赤’固所以安川;就症结考究,必安川乃能‘剿赤’。盖川事如不臻安定,戎区未破,各怀观望,犬牙相错,易生误会,即言‘剿赤’,亦难竟全功。过去川北剿‘匪’之时张时弛,固足证明其难于彻底。”<sup>〔8〕</sup>田颂尧也认为:“惟‘剿匪’必须统筹,方免观望因循之误;定川必先统一,方有建设治理可言。”<sup>〔9〕</sup>1936年12月,刘湘呈送给蒋介石的治川方案就是:“半年内扫除统一障碍,组织省府。一年内剿灭共匪,一年半内划清中央与地方之税收,及整缩军队。”

而在蒋介石看来,“共匪据川,为祸之烈,远在鄂赣之上”,“川亡,中国亦亡”。国民政府于1935年远月初在陕西查获共产党文件,内称“徐匪整理六个月,确有赤化川陕甘,打通西北路线之整个计划”;恰好此时川战又起,加之“川情复杂,民怨已深”,川军“尤有(被)各个击破,逐渐崩溃之可能”<sup>⑤</sup>。若川军真的整个崩溃,红军乘势“赤化”四川,并进而打通西北国际路线,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威胁实不言而喻。因此,南京中央认为红军“赤化”全川才是最大的威胁和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故其自始至终都反对此次川战,并“竭力调和二刘之内讧暗斗”。

蒋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此时甫澄对自乾只用威胁,使其退让,而勿与直接冲突。一俟中央任甫澄为四川剿匪总司令后,一面负责指挥剿匪,一面制裁不遵令者,则名实既正,统一可期”;如果不先行剿匪,“视赤匪之坐大而不顾将来,必致不可收拾,两败俱伤”。蒋还认为,“对文辉军事行动,此时决无根本解决之望”;而且,川战有可能把刘文辉逼到“携贰”的局面。和往常一样,川战又牵涉黔局和整个西南局势,容易引起连锁反应。当时蒋介石就得到情报,黔变中,“毛(光翔)犹(国才)方面,颇得渝刘(湘)助力”。而与刘文辉颇有瓜葛的王家烈却可能“以桂为后盾,徐图再举”,以致蒋深感“川黔之局势,以速使安定为宜”<sup>⑥</sup>。

不过,当“二刘大战”基本结束之时,蒋也认为“四川方面,刘文辉败退川西,则川事亦比较进步”,实为可慰。然而,当刘湘等人实现“安川”之后,却发现红军的势力已大为扩张,“剿匪”实为不易,且屡遭失败;在双方妥协之下,刘湘不得不同意中央军参谋团入川协助剿匪。这无疑是刘湘所不愿看到的,也是他不曾料到的。

### 三 摇社会舆论与国家意识

“二刘大战”爆发后,许多人即认为:“即使刘文辉真败,刘湘果胜,川局前途亦不过仍在循环局面中攘扰罢了”;“苟不于其根本之原因上求一适当之改革,则川战恐将随民国而终古”,加之红军“借四川战乱的时机”,在川北建立根据地,使得国人不得不更“深刻地注意”四川的混乱情形,全国舆论也几乎一致地给予了批评。

二刘大战的爆发,使得国际间“对华舆论日益恶劣,影响中日问题者至大”。而且,1935年爆发的

第三次康藏纠纷此时仍未解决,藏军和刘文辉指挥的川康边防军仍然对峙于金沙江。而在国人的认知中,藏军背后肯定有英帝国主义者的怂恿和指使,因此舆论大多批判川军不全力抵抗藏军的侵占,反而肆无忌惮地进行内战,正是“与垂涎我疆域者以攫夺之机会,表面上称为内讧,实际上等于卖国”。

对于四川军阀为何敢于逆势而混战,舆论认为:“原因虽多,而中央威信不彰,遇事敷衍,亦实有以致之”;“内战特病象之一枝节,今日之事,须速治中枢病根。总根不治,百病不已”。四年来,四川各军阀“莫不勾结外援以自重,往往随中央权势之分合,以为迎拒”,正所谓“上无道揆,下无法守”,“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舆论质问:“争者之两造,皆非来自他省,且皆为中央所曾正式任命之大员,乃竟以兵戈相见于疆场。而文电中对于所与争之对方,俨然以仇敌相加,且对中央报告战况,语气闻恒自夸耀其胜利。默察此类心理,正不知其将置中央于何地也。”“(川军将领)各自下决心消灭对方的部队,但一定会胜利吗?即算侥幸胜利了,敌军的损失还不是中华民国的损失?”

中央政府之所以不能“建树其权威于川省”,实因“平日利用军人撑持苟安之局面,形成尾大不掉之势,遇有变故,遂无法制止,于是委屈求全,不问是非,进行调解,造成“上无守法之政府,下多跋扈之军人”,以至于“(中央政府)历年西征北伐,国人未以为当然之权威,而比之于内乱,讥之为相残者,其事绩亦不谓少”。

而在一般野心军阀心目中,中央之地位“乃仅一筹款及发表新官之工具,而非国家最高权力所寄托,一切皆可任性为之,而无所用其顾虑矣”;军阀们“以为我有武力,我即可有主持一省之实权,至于名义之追认,只须一纸文电之手续耳,故其对于中央,常有若即若离之概”。“二刘大战”爆发之时,刘文辉是国民政府正式任命的四川省主席,刘湘也职任四川善后督办,舆论一方面质疑“以现役军人而擅省委、省主席,宁为国法所能容许”;另一方面又指出,双方都是中央正式任命的地方大吏,“其进退须听命中央”,“不可任意加以兵戎”,且“国家养兵原以御侮,非可作政争之工具”。而中央政府屡次严令双方停止战事,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虽然,“土地为国家之土地,名位为国家之名位”,而

得失仅凭个人之“角力”,这正是当时中国政局混乱的根本原因。

舆论认为,树立“轨范”,树立“纪纲”,才是中央政府“建树其权威”的根本途径。所谓“轨范”即是“法治”,“法不立则纪纲何从出”,然而当时形势是“竟若无人敢言法治,一若言及法治,即为叛逆也者”。如此一来,中央政府则不能“巩固其本身之法律上地位”,只有“徒见国事之日益纷乱而已”。舆论并引申说:“然则内争真正之戎首,祸及全国之罪魁,非尽属横暴之军人,而实为彼破坏民主法治政制,妄想武力统一而行专制独裁之人物也。武力统一之梦不醒,独裁之念不休,民主法治之政府不成,则军阀之互争为必然之结果。”<sup>〔1〕</sup>可见,舆论用意所指,已不仅仅在军阀之内战,而在促成民主法治,反对专治独裁,和当时的全国政局有所关联。

正如舆论所说:“纪纲之基础,在法律而不在武力,在民意而不在威权。”有意思的是,参与“二刘大战”的军阀罗泽洲,稍早前也在呼吁南京树立“纪纲”,惩治叛变的陈光藻并夺其职位。他说:“川中循环叛变,实为致乱之阶,纪纲早已废弛,大都皆以奖乱嗾叛为能事,故为善者不知所劝,为恶者亦无所惩。”“假使民国成为无纪纲之国,而川省仍为中央政令所不及,则擅自称谓,固可惟力是视,今党国已届统一,而川中各军皆同在拥护中央旗帜之下,则名分岂能假借。”<sup>〔2〕</sup>

授予“名”“器”的是中央政府,因此中央政府“自应明辨是非,以定曲直。凡称兵肇事,而为舆情所不附、公理所难容者,一经查明,即应严令制裁,制裁不服,即明令讨伐。惩奖出于至公,好恶与民同一,如是庶几纲纪可振、内战可消”。当时,国民政府有意派遣戴季陶或张群等中央大员赴川调解,却遭到舆论的抨击,“良以名器所在,法制赫然,安有以中央对地方事件,始终以调人自居者乎”。地方军人火拼,中央不得已而派遣大员调解,实属“大附威信之举”。中央政府“对于境内军人危害国家之内战,命令制止而已,制止不听,派兵讨伐而已。中央政府之于地方,无调解之可言;中央政府之于地方军人,执行命令而外,更无观望疏通之可言。”<sup>〔3〕</sup>

对于中央政府究应如何介入并解决纠纷,舆论也有周到细致的分析:“依川民全体福利言,一切残民害国之军阀,胥在应当打倒之列。故中央果有力统一全川,尽逐诸阉,改造川局,出民水火,其上者

也。其次,则以严正公道之态度,悬一整理川局之标的,其命于此者奖进之、扶持之,苟非然者断然不予敷衍。若夫漫无定见,依违各方之间,实际则徒受利用,反被操纵,是直长乱造乱耳,此其最下者也。”<sup>〔4〕</sup>

更有舆论“反求诸己”,认为内战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国民没有尽到本分,“内战之生,由于政府不强;政府不强,由于其本身不健全,基础不宏大。是以闻内战之起也,不能专骂内战者,应责政府,然亦不能仅责政府,应并责国民己身”。军阀之好乱,并非与生俱来,实由民权之不发达有以致之。“民权之不发达,实由民众忽视其本身之力量,而民众力量之不易表现,又由于民众之不团结”,因此全国民众必须团结起来、一致反对内战。<sup>〔5〕</sup>

当时刘文辉、田颂尧两军所进行的成都巷战,一连九日,“总计死亡人民,共有二千数百人之多,受流弹之轻重伤害者,更无法数,至于全市财产损失,则在数千百万元以外”,其残酷惨毒,“不让于日帝国主义之践踏东省、蹂躏淞沪”<sup>〔6〕</sup>。刘文辉与刘湘两军的交战也创造了内战新纪录,“一日之战死亡达四万人”,人们不得不惊叹“他们的勇敢真不在东北义勇军之下”<sup>〔7〕</sup>。甚至有人喊出,如果中央政府仍不能制止川战,则“宁为亡国奴,不作四川民”<sup>〔8〕</sup>。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舆论指出,如果中央政府“仍欲利用军阀为走狗,以人民为牛羊,保持暂时之统一,不求彻底之解决,徘徊瞻徇,一误再误,因循敷衍,潜伏祸机,人民愤极怒生,为求生存,不难以直接手段打倒军阀,解除其切身之痛苦与压迫。则号称民众谋利益之革命政府,将何以自解于川民?吾人深信公理尚在人间,胜利属于大众”<sup>〔9〕</sup>。此话非常值得注意,号称民众谋利益之“革命政府”,居然利用军阀为走狗,“残余的军阀主义”确实存在,这正应了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那句话。

#### 四摇余论

1935年5月20日,国民党四川旅京同志会即发表请愿宣言,要求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用武力解决四川问题,以“完成国民革命”<sup>〔10〕</sup>。到1936年的时候,还有人认为:“自国民政府成立以来,中央对于四川的统一,似乎始终未加注意。中央对川的政策,可以说是听其自寻出路——也可以说是自寻死路,四川历年的乱事,是中央放任的结

果。”<sup>[1]</sup>

如果从某种角度来看，“二刘大战”确有其非常积极的一面。它基本结束了民初以来四川军阀连年混战的局面，为四川的基本统一奠定了基础，加上当时红军入川，为国民党中央军入川提供了机遇，使四川逐渐纳入国民政府统一治理范围，奠定了四川后来作为“抗战司令台”之基础<sup>[2]</sup>。然而，无论对四川地方势力还是南京政府来说，这样的统一更多的是形式上的，远远没有达到实质上的统一。到1937年，还有人认为，“现在已经完成的统一，大体上还是消极的统一，不是积极的统一，仅是不内战，不分割的统一，不是上下一心，中央地方完全通力合作的统一”<sup>[3]</sup>。1939年9月，邓小平也说：“在政治上来说，民国以来四川从未统一过，抗战期间只是形式上的统一。”<sup>[4]</sup>

当刘湘暂时打败刘文辉后，回过头来却发现红军的势力恰如蒋介石所屡次告诫的那样已迅速扩大，单凭一己的力量很难收平；而且邓锡侯、田颂尧等人也多是阳奉阴违，并不愿真心消耗所剩无几的实力去“剿匪”。不得已，刘湘只好同意蒋介石的中央军参谋团入川，由此引入中央的势力。这对刘湘在四川的统治无疑是一个新的威胁，甚至是比四川其他军阀大得多的威胁。

大战的另一主角刘文辉也因此役和蒋介石累积了更多的心结与矛盾，且一直难以化解，这对此后川康政局的发展演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刘文辉虽借西康建省迅速建立了一个新的立足地，但仍然念念不忘掌控四川的军政局势，特别是在刘湘死后，刘文辉力图重新谋取四川省主席一职。孙震回忆说：“惟川政在新调整之后，觊觎川政之人仍甚多，尤以西康省主席兼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以前曾多年奉中央命令兼任四川省主席名义，现在该军又未出川参加抗日，中央循文辉之意，留置该军于川康境内，因之刘氏对四川省主席一职尤为积极进取。”<sup>[5]</sup>刘文辉虽未能如愿，但他联合四川其他军阀抵制国民政府的布局，也迫使国民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sup>[6]</sup>。更为重要的是，1935年国共两军做最后决战的时候，仍然控制西康和四川军政大局的刘文辉、邓锡侯和刘湘的老部下潘文华联合发动“彭县起义”，宣布脱离国民政府，这对蒋介石无疑是重大打击。

对全国民众来说，南京国民政府的威信及其“合道性”在这一次战争中也遭到了更深的质疑。

本来，当时主流舆论的“国家意识”是很强的，全国人心也是向往真正统一的，南京政府却并不能很好地把握和利用民意和民气。大多数舆论认为，川战之所以发生，乃因中央不强固，中央不守法纪，而且中央对于川局“始终无一定方案，缺强毅主张”，也无法号令四川军阀，人们对中央政府的认同度也就不可避免地降低了。张国焘就发现：“在四川人看来，四川就是一个国度，他们所注意和谈论的都是关于四川的事。甚至‘国民党’、‘三民主义’和‘蒋介石’这类的名词，究竟内涵是些什么，不仅一般老百姓弄不清楚，就是当地的军阀，也不甚了然。”<sup>[7]</sup>连一些军阀对“国民党”、“三民主义”和“蒋介石”这类名词的内涵都不甚了然，不能不说是人们对国民政府及其领导人的认同度不高。

更为重要的是，“二刘大战”进行期间，红军入川并在川北大有发展，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树起了“革命”的旗帜<sup>[8]</sup>。而且，“二刘大战”又一次造成了无数的失业流民，使他们“除了为兵为匪和不绝地暴乱之外，再也没有出路”，大大“加深了社会的革命危机”<sup>[9]</sup>。刘湘也认为，红军在川北的“猖獗”，“率由川西内战所演成”，他之所以“武装制裁”刘文辉和邓锡侯的冲突，“诚亦怵于上川南抗捐军声势浩大，见诸赤焰弥漫之先机”。舆论也说：“屡年内讷之结果，枪支之散在民间者何止数十万挺，赤潮潜伏，隐患滋多。长此用兵，则社会革命之不可幸免，又为理所必有。”<sup>[10]</sup>“倘执政者在此国家创巨痛深之日，而仍不能彻底奋发，俾全国有良心与热血者，共信确有救国之途径，并信赖其能实行，则思想之极端化，虽严刑峻法，不能收制止之效也。”<sup>[11]</sup>号称民众谋利益之“革命政府”，成立不过几年，却又面临被人“革命”的压力。难怪南京政府一直认为红军才是最大的威胁，“剿匪”应先于“安川”。

当时的全国，可以说东西南北“皆有显患或隐忧，活画出一个不统一之中国”，而中国复兴之第一步，“即需要形成一个坚固统一的国家，此乃绝对的条件，超越于主义思想以上者也”。然而，南京国民政府所领导的“国家统一”运动，不仅仅受到地方主义的抗拒，也受到中共的强烈挑战，特别是当地方政争与苏维埃根据地发展两者同时发生之时，南京政府必须站在“中央”的高度，尽力协调地方各派势力，以和中共势力竞争，不然地方势力的捭阖和民心的转向将使其走上被再“革命”的命运。



